

一、狗尾“序”貂

《时间与传统》* 序言

布鲁斯·坎格尔教授的《时间与传统》是一本讲考古学理论的好书，在美加考古学界也是受人尊敬和重视的一本书。它的中译本对现阶段中国考古学的进展应当是有积极影响的。

考古学理论在中国一向不大受人重视。最近两年来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年鉴》对当代中国考古研究活动固然是很可靠的反映，而在这里面根本没有“考古学理论”这个范畴。可见“理论”这件东西在当代中国考古活动中可以说没有什么地位。我相信中国考古学界对理论的漠视不是偶然的，而有它历史上的一些因素。首先，中国传统史学本来就缺乏对历史理论的有系统的讨论。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人的历史只包含赤裸裸的、明确的事实，而对它们不加以任何意见或推论。”固然这种观察是很不可靠的，但传统史学的确有特别着重对客观史实的记述的一面。它的另一面则是利用史实的选择和描述来表明历史学家对价值系统的主观判断，所以自孔子以来便有“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现象。这种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的作风，自有它趋于极端的一面，所以近代西方史学输入中国以后，便首先以传统史学的这一特征为打击的对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人

* 布鲁斯·坎格尔著 蒋祖棣、刘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

傅斯年先生在 1928 年出版的《集刊》发刊词中就疾呼要打倒“把那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或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为一气的人”！历史语言研究所代表的史学观认为“历史学不是著史”；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可以说，以反抗传统史学之末流的仁义道德史学为特征的这种史料学，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占据领导或至少是优势地位。在这种历史观培育下发展起来的考古学，也就特别重视考古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常以为“理论”不过是一种成见，因而把理论硬套在考古材料上便不是严谨的治学方式。这种以史料及史料考证、排比为主的历史观在近三四十年曾受过剧烈的批评和批判，而且近年来中国历史界对历史理论进行讨论的兴趣也有很大提高。不过，在考古学上惟一有系统的指导理论，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关于这种理论在考古学的作业上如何具体运用，一直很少经过缜密的思考和田野实践。所以，马恩的唯物史观虽然对中国历史在宏观上起了巨大的、高级的指导作用，不过据我的观察，它还没有广泛地在中国考古学的作业中发挥很大的具体作用。

其实，要讨论考古学理论在中国考古实践中的作用和意义，我们首先得说清楚在我们使用“考古学理论”这个名词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概念是什么。最近在《考古学专题六讲》这本书里，我把自己对几个常用的有关名词的用法说明了一下：“资料”是研究历史的客观基础；“技术”是取得资料的手段；“方法”是研究资料的手段；“理论”是研究人类历史的规律性认识的总结，并反过来指导具体的研究工作。上面这个对理论的定义，我想一般是可以使用的。但这个定义比较狭窄严谨，因而在一般的运用中，我们不妨把它放宽些。我们可以说，考古学上的理论是在考

古作业的每个步骤上指导我们作何选择，如何做此选择的、关于文化现实、社会现实的有系统的一套看法和想法。换句话说，在考古实践中，我们应当先知其所以然才能决定其然。使我们能知其然的便是考古理论。口口声声说他不相信考古理论，或者说他没有考古理论的人，并不是真没有考古理论，而是只有未经检讨的、不成系统的、或者甚至是迷惑混乱的理论。进行考古实践并不是遵循一条不变的道路盲目自动地向前走，而是每一个步骤都会碰到岔路，需要加以选择。有理论的人进行这种选择是有根据的、有信心的；没有理论的人，进行这种选择是盲目的。

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考古实践离不开考古理论。我们到田野去调查遗址的时候，应该如何调查？考古调查不是只有一个不变的方式，而是根据我们调查的目的和对古代文化社会生活的不同了解而有所区别。有人看到不同的遗物群便把它们当做不同的文化；另一些人则把它们看做是同一或不同文化对不同生活需要所做的不同适应性行为的表现。这两种不同的看法便对我们调查的范围、深度、顺序以及发掘与否等诸决定，有很大关系。考古发掘更是一套复杂的程序，从打桩子到回填之间一步步的工作应如何进行，有着许多不同的方式。怎样能忠实地记录资料，同时又能提供回答特定问题的资料，这就要看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的具体地点、范围、各种专业人员的使用、发掘的细密程度等等问题上进行怎样的选择。发掘出来的遗物如何进行处理？有哪些可以留下来，哪些可以抛弃？对器物进行分类是为了什么目的？为了这种目的又应当使用哪些分类标准？——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每个考古工作者必须回答的。无论是否意识到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在进行自己的选择时，考古学者是一定要应用他对历史认识的理论的。这

几个例子应该可以说明考古理论与考古实践不可分割的关系。理论并不是一种空洞的主观成见。它需要与客观资料相对照。考古工作者不会没有理论，只是有人有好的理论，有人有不好的理论。如果有的考古工作者认为考古学的理论不足重视的话，我们不妨问一问，是盲目地使用主观的、未经检讨的理论好，还是先对自己的理论体系做一番检讨好呢？

四五十年来，世界考古学理论的中心很显然在美国。这并不是说美国有最好、最正确的考古学理论，而是说美国考古学界的理论是多元化的，也是特别发达的。因此，考古学工作可在许多丰富的理论体系中做适合自己立场与见解的选择，并且在这些体系中不断得到启示和刺激。事实上，就西方考古学史来说，考古学理论的有意识的发展也不过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的现象。在这以前，西方考古学也是以器物为主要对象的。即以器物史的发现和文化史的重建为主要的目标。因而，这种研究的主要方法便是年代学、地层学和类型学。30 年代欧洲考古工作者开始对这种情况感到不满，不少人开始主张，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应当从器物转向人。考古学资料是物。如何从物去研究人的生活，这便要有借于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指导。在这方面比较有名的一篇文章是英国戈登·柴尔德在英国史前学会以 1936 年年刊上发表的一篇《史前史变化中的方法与目标》，其中就大力主张考古学者在理论上要有意识、有系统地讨论如何研究史前时代经济生活、社会生活这一类的问题。这篇文章在西方考古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不过，考古学理论的蓬勃发展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自 40 年代晚期到 50 年代初期开始，关于这方面的讨论研究的中心转移到了美国，并且数十年不衰。自 1950 年以来，美国考古学理论的书刊与论文无疑有数

千、数万之多。中国考古学界如果在这方面有加以探索的兴趣，这无疑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园地，其中有不少值得参考，值得作为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选了布鲁斯·坎格尔这本书翻译并介绍给中国读者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正因为考古学理论在美国特别发达，以致各种说法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其中良莠不齐，有精华也有渣滓，要在美国关于考古理论的千万种著作中汲取精华，必须首先做一番爬梳清理工作，除滓存精，才不致事倍功半。布鲁斯·坎格尔是加拿大人，在蒙特利尔的马克格尔大学任教。他的博士学位是在美国耶鲁大学得到的，而且多年来，他在美国考古学理论界一直占有一席非常令人重视的地位。他所以为人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他不仅有精深的见解，而且持论公平，不属于哪门哪派，对当代各种新旧说法都能客观地做正面、反面的检讨和批评、整理。读者读他的文章，能中肯地把握理论上的一些基本窍门，对各派学说的要旨优劣都能掌握，最后可以作明智的抉择。现在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在即，相信它对中国考古学理论方面的进展一定会起积极、肯定的作用，所以很高兴地写这几段话以志同声之欣悦。

1987年4月于美国哈佛大学

《安阳》* 张序

《安阳》是先师李济先生最后的一本专著；像它的作者一样，这本书在中国考古学的园地里伟大的历史意义。如今它的中译本问世在即，令人感到兴奋。

自从 1928 年第一次发掘安阳殷墟到今天已经 63 个寒暑了。我们对殷墟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重要性的认识，不但没有被岁月的消逝所冲淡，反而越来越在中国考古学持续发展过程的启示之下而更觉得清楚了。这个重要性，一方面是由于殷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头一个用现代科学方法作长期发掘的遗址，所以在殷墟发掘过程中考古学者们所经验出来的心得，对以后半世纪中考古工作者思想和研究的习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殷墟是目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有文字记录的考古遗址，它对于中国史前和历史时期间的关系的了解上，便发生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至少在目前的知识范围之内，我们可以这样说。学习中国考古学者最好自学习殷墟开始；学习中国近代考古学史者，也最好自学习殷墟开始。

从中国考古学史上说，李济先生的名字是与殷墟分不开的。有中国考古学之父的称号的李济先生是中央研究院自 1929 年

* 李济著，贾士蘅译。

到 1937 年发掘殷墟工作的总指挥。在 1949 年以后李先生又在台湾用了 30 年的时间进行战前发掘出来的成果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他一生的学术著作也以殷墟和殷商文化为中心。给学习殷墟的学生带路的人，再没有比李先生更合适的了。这本《安阳》是李先生给殷墟发掘和研究所做的一个总结。教中国考古学的课用这本书作头一本入门书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可是《安阳》原书是用英文写的；在国内教书的人对这本书的中文版的问世，可以说是久已望眼欲穿了。

贾士蘅女士翻译这本书为中文，也是再合适不过了。李先生写这本书的时候 年纪已经很大 身体欠佳 行动不便 在这本书的材料搜集与写作上，贾女士给了李先生很大的帮助。如今由她自己翻成中文，自是驾轻就熟，对作者的原意也比任何他人都能了解。贾女士嘱我为中译本作序，就写了这几段话以志喜悦。

1991 年 5 月 4 日

《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庆祝郑德坤教授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论文集》* 序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研究中国南部及邻近地区的国际性的研讨会，将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越南的 44 篇论文，编辑出版，这是中国地区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南部考古学起步较北方为晚，在过去又由于传统史学重中原轻边疆的偏见而被忽视，所以考古与古史研究成果不如华北。近年来，部分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考古材料出土增加。南方各省的考古文物单位，包括香港中大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在内，又有计划、有目的地扩大了调查、发掘的规模和范围，发现了许多引起国内国外密切注意的新资料与新问题。中国文化研究所在此时此地召开这个学术研讨会，可说正是迎合天时地利人和的良机。

在“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这个会议上，同时要庆祝人类考古界前辈学者郑德坤教授从事学术活动 60 周年，这尤其令人感奋。郑先生与中国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古代文

*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郑聪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 年。

化研究史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知道今天还有人记得不，福建省最早的考古发掘工作，是郑德坤先生主持的。1936年春季，泉州市中山公园建盖体育场时，在地下发现古代墓葬。厦门大学附中教员庄为玠先生看到了，便买了几块砖头带回厦门。那时候才29岁的郑德坤先生是厦门大学文化陈列所的所长，他知道了这事便与庄先生和林惠祥先生一起去泉州发掘。他们一共工作了9天发现了4座唐代的砖墓（这次发掘的收获后来在1939年的《哈佛亚洲学报》中发表）就在那年下半，郑先生转往四川成都的华西大学任教，后来将四川古代文化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园地。但他对东南海岸一带的考古一直挂念在心。1983年郑先生还在香港中大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曾计划召开一个“中国东南海岸地区史前文化研讨会”邀约已故的林寿晋先生与我协助他计划和筹措。这个会议拟邀请的学者的名单和拟讨论的题目都已大定，但因为经费的关系，一直未能实现。但是郑先生这一愿望，今天在这个“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研讨会中成为事实了。我们今天将这个会中提出来的44篇论文贡献给郑先生，向他自1933年开始在厦门大学任教以来60年如一日从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的精神与重大的贡献来表达我们的敬意，真是再也合适不过了。

郑德坤先生60年来，陆续在厦门大学、华西大学、英国剑桥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对中国考古学、史学、艺术和人类学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将他的多方面的贡献做详细的分析，然后把它们做一个综合的报告，是一件规模庞大的研究计划，我有从事的野心，却不知能否胜任。但是，在郑先生的著作中很显著地可以看出来一个特点，也是与香港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宗旨，并且与今天这个会议的内容都有关系的，

这就是郑先生不论是讲学还是著述，他的着眼点都是以中国文化的一般特征以及中国文化各方面之间的联系关系为主题。郑先生的文章有题目极大的如《中国文明之始》（“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载 *Antiquity*, XLVII, 1973）也有题目极窄的，如《若干中国伊斯兰的幻方瓷》（“Some Chinese Islamic Magic Square Porcelain”，载 *Journal of Asian Art* , No. 1 , Lee Kong Chian Museum of Asian Culture, Nanyang University, Singapore）。大题目能旁征博引，发挥得淋漓尽致，小题目则深入浅出，论证到无懈可击。总看郑先生写作的范围，没有办法给他一个标签，说他是哪个题目的专家；他的题目环绕着“中国文化”这个极大的圈圈转，合起来就将中国文化从无数的据点界说起来。郑先生当然是个考古学家，但是他不止是个考古学家，他也是史学家，美术史家，艺术鉴赏家，古地理学家，人类学家等等。我想可以说郑先生是个中国文化学的学者，与老式的西方的汉学家有许多相似。中国近代学者里面可与郑先生比较的是杨联升先生，只是杨先生立足于史学，郑先生立足于考古学而已。

1969年3月，郑先生在香港写信来说：“我们研究人类学，对于文化与人的关系应该有点认识，各民族各有他们的文化。文化就像空气一样是生活生存的要素。不幸我们处于动荡的时代，流落海外，年暮思乡，每感到他国的文化与我们的不一般。最缺乏的是人情。朋友来往无论多么浓密，总缺少了些人情味。早年忙于生活工作，不觉得，越老越知道我们故有文化的宝贵。几千年的演进，继续存在，不是无因。去年有这讲演机会，因此把一些思想系统化，一方面讲给学生听，一方面拿来和一些海外‘难民’互相讨论。来信讨论与以共鸣的，确有几入。台北老友且建议重印在国内发行，据说要列入中山文库第一册，以广传

流。这种积极的态度比较我死抱古书，壁补丹青，櫛陈金石，闲摸麻将聊慰乡愁要高一筹了。未知你以为何如？”这里所说“去年有这讲演机会”是指1968年郑先生应新加坡南洋大学副校长刘曜的邀请，在南洋大学讲中国人类学的课。郑先生在这封信所描写的心境之下，便利用这个讲演的机会，从人类学的角度讲了中国文化。他的讲演稿不久便在南洋大学以《中国文化人类学》为题出版。在这本书之前，1962年郑先生客居马来亚大学，协助成立中国研究系，同时给了一系列的有关中国语言和历史的演讲。演讲的记录稿后来编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书。在1978年郑先生把这两本书整理修订，又出版了中文的《中华民族文化史论》。1980年郑先生又用英文出版了 *The World of the Chinese: A Struggle for Human Unity*。这些单刊都是郑先生对中国文化研究的综合与总结，而他的各种专业论文可以看做郑先生对中国文化整个看法的个案研究。

这个国际研讨会“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在研究中国文化的早期历史上，也将提出重要的贡献。中国南部古代文化有它自己的特性，而且在很早的年代便达到很高的文化水平，这已经是大家公认的前提了。现在中外学者讲到中国古代文化都流行使用“区域文化”这个术语例如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的区域文化，大汶口文化是山东半岛的区域文化，大溪文化是长江中游的区域文化，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下游区域文化，等等。这些区域文化并不是完全孤立生存，孤立发展的。它们在生长过程中难免发生接触、交流的情况。前几年在河南濮阳发现过仰韶文化时代用蚌壳摆成的龙的形象，最近又在湖北黄梅发现大溪文化时代用河卵石摆成的龙的形象。这两条龙都是公元前四五千年前的产物，但是属于不同的区域文化。年代再稍晚些，

龙又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中出现。龙作为艺术形象，代表一定的宇宙观。辽河，黄河，长江流域在大略同时都出现龙的形象，恐怕不是巧合，而要反映这几个区域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系或接触关系。中国文化的确要有许多源头，但这许多源头在什么时候汇聚成为中华文化？这是要靠考古，古史学家将公元前一万年来全中国境内的文化资料仔细比较研究以后才能得到答案。这个论文集包含许多讨论南方史前文化特征的文章，为今后与北方文化的比较奠定了基础。更多篇的文章，专门讨论南方——尤其香港——古代的牙璋在南北文化接触上的启示。这里每篇文章，都有它自己的主题和意义，但总起来看，它们讨论了中国文化形成的早期历史上南北关系的一些重要问题。我们将这本论文集呈献给郑德坤先生，希望它标志着在郑先生的中华民族文化史研究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了一步。

《考古与历史文化——庆祝 高去寻先生八十大寿论文集》* 序

1989年7月1日是高去寻先生80岁的生日，我们这一群高先生的学生借这个良辰吉日将这本文学论文集呈给高先生为他祝寿。

高去寻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全世界研究中国古史与考古学的学者所熟知的，不必在这个场合详细叙述。自从高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在1935年秋季参加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以后，他这55年以来的学术事业便与殷墟的发掘、研究，与成果的报告离不开了。高先生在殷墟研究上最重要的贡献，无疑地是他近30年来陆续发表的殷墟西北岗王室大墓的报告。这11座大墓的报告是梁思永先生生前开始写作的，但梁先生在1954年逝世以前只写成了22万字的未完稿。从1962年起，高先生全力辑补梁先生稿，将西北岗的大墓一个接着一个详细的描述发表出来，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上最重要的一批新资料。除此以外，高先生在殷墟大司空村墓葬（是他在1936年秋季主持发掘的）所表现的殷代礼制、殷墟出土的文字，与殷周青铜器的形制的研究上，都有独

* 宋文薰、李亦园、许倬云、张光直主编，正中书局，台北，1991年。

到的见解。高先生又是在中国考古学者首先详细讨论中国黄河流域古代文明与北方文明之间的关系的。

我们有幸作为高先生的学生，都深深感到高先生的教导对我们每个人的学术生命是有过深重的影响的。高先生对我们的教育远不限于他丰富学识的传递，他对他的学生们更大的影响还是由于他认真纯正的性格给我们所作的为学、为人的榜样。他之教育学生是认真详尽、毫无保留的。记得 1950 年他第一次到我们的母校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开中国考古学的课，用一年的时间来准备课程，然后把他准备的材料，就是中国考古学自金石时代起、经过 20 世纪 20 年代西方科学考古输入，一直到 1949 年中央研究院迁台以前为止的全部经过与成果，一年一年的，每本书、每篇论文都给他的学生查找撮要出来，从杨梅坐火车到台北来上课时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我们在中国考古学上的基础，就是高先生这样替我们打出来的。这位举世闻名的学者，与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打成一片，以诚心相处，40 年来，不但是我们的良师，而且是无话不说的益友。这是因为高先生虽然较我们年长，却一直抱着一颗赤子之心，一心只知为学，把他的学生都当作为学道上同伴，一方面不容情地指出我们的错误，一方面又鼓励我们从事独立思考、鼓励我们有新的看法。历史语言研究所出身的高先生这一代的学者中像高先生这样的纯真学者当然不只他一个人，但高先生是与我们最亲近的一位，也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一位。我们除了学习高先生的学问以外，还希望学他的为人，也希望能像他这样对待我们的学生。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复杂，做人也越来越难，但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一代和在我们以后代代的学者中，像高先生这样以做学问和教学生为纯一念头的人不绝如缕。

高先生 80 大寿的场合，我们谨向他呈献这本论文集作为祝寿之意，但更希望他仍照例告诉我们他对文章的看法，纠正文章中的错误，或与我们辩论文章中的细节。

宋文薰

李亦园

许倬云

张光直